

秦代“初为赋”质疑

陈 英

(甘肃联合大学人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内容摘要】本文在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秦代“初为赋”进行再研究,认为多年来专家各持己见莫衷一是的“初为赋”是汉代赏算的源起,它的产生经历了由西周春秋的军赋向战国户赋、秦代赏赋这样一个演变历程。

【关键词】秦代 “初为赋” 赏算

中图分类号 K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0)01-0118-03

商鞅在秦国第二次变法时,于秦孝公十四年(公元前348年)颁布“初为赋”^[1]。究竟创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赋,向来看法不一。《集解》引徐广语:“制贡赋之法也。”《索隐》:“谯周云:初为军赋也。”《中国农民负担史》一书认为徐广所说不够明确,谯周的说法也有疑问。因为秦王朝统一之前打了多年的仗,不可能迟至孝公十四年才开始建立军赋制度;而且孝公用商鞅变法废除了井田,也不可能再去建立那种以井田为基础的军赋制度^[2]。《资治通鉴》对此另有看法,在卷二周显王二十一年:“秦商鞅更为赋税法行之。”胡三省注:“井田既废,则周什一法不复用,盖计亩而为赋税之法。”杨宽认为徐广所说“制贡赋之法”是没有根据的,司马光所说“更为赋税法”也只是出于推想,说得不具体,胡三省解释为“计亩而为赋税”显然是错误的,基本把三位古人观点全部否定。他认为在前人所有“初为赋”的解释中以董仲舒《七国考》最为正确。日本加藤繁《关于算赋的小研究》的说法十分有理,即都认为是“口赋”^[3]。而晋文在《“初为赋”新探》^[4]一文认为:“初为赋”既不是田赋,因前五十年已有“初租禾”,也不是军赋,对林剑鸣、熊德基、黄今言先生都认为是口赋持不同意见,得出结论是包括了上述三种赋敛。重近启树《秦汉税役体系之研究》(1999年)第三章“算赋制的起源与发展”对过去认为“算赋”乃口算和赏算之总称的说法提出了批评,指出算赋乃口算之意。关于汉代算赋的起源,重近启树认为是随着秦国商鞅第二次变法实施阡陌制与授田制之后,比较平均规模的小农阶层大量出现,以此为背景均等课税的人头税制开始形成。秦代称此人头税为户赋,汉代则称之为算赋、口赋^[5]。实际认可秦代“初为赋”就是户赋。何兹全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6]一书用了三条材料也证明是秦人的口赋:一是董仲舒所说的“秦……用商鞅之法,……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7]。二是秦末张耳号召人民起事反秦时说“秦为乱政……数十年矣……百姓罢敝,

头会箕敛,以供军费。”^[8]三是《淮南子·汜论训》做“箕敛”。又引高诱注:“头会,随民口数,人责其税。”即按口征收。从以上情况看,专家们对此没有统一的认定,处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境地。在此,笔者不揣简陋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初为赋”是秦代按户征收赏算即资产税的源起,它的产生经历了由西周春秋的军赋向战国户赋、秦代赏赋的演变历程。

—

要了解“初为赋”的起因,首先要明确什么是“赋”。据《周礼·大司马》注:“赋谓出车徒,给徭役也。”赋敛的征课早在殷周时就已有之。《汉书·食货志》:“殷周之时,有赋有税。赋供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宗庙郊社百神之事,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又,自殷周以来“租”与“赋”的用途不同。《汉书·刑法志》:“税以足食,赋以足兵”。赋从“武”,从字意上揆之应属于军赋。“赋”的征敛主要是军备供养之用。西周天子将土地臣民分封给诸侯,诸侯就有遵从王命率军随其征伐的义务。诸侯将土地再分封给卿大夫,卿大夫也有向国君缴纳军赋的义务。《左传》昭公十六年:“有禄于国,有赋于军”,反映出分封制下各级贵族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随着土地制度与贡税制的变化,军赋的征收也相应进行改革。原来军赋的征收是按井田编制以若干家(夫)为单位调发的,所谓“建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9]就是指此,改革后则以土地面积作为征发标准,如公元前590年鲁国“初税亩”后的第五年开始改革军赋制度——“作丘甲”^[10],公元前538年郑国也在子产改变井田编制之后五年改革军赋征收制度——“作丘赋”^[10]。鲁、郑两国改革是按地区范围来征收军赋,实际上就是要一丘之人各按所占田数分摊军赋。此后,公元前548年楚国在重新调查登记土地“书土田”时也实行“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卒、甲盾之数”^[10],同样对田制和军赋制度进行改革。值得特

* 作者简介 陈英,甘肃联合大学副教授,厦门大学专门史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史。

别提出的是,春秋军赋的征发已不仅限于兵员与车马、甲盾之类军需品,而且扩大为对其他财物的征调与勒索。如公元前513年“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10]。《国语·鲁语》:“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据谷霁光先生解释^[11]:里为古代划分居民聚居的地区单位,征赋根据“里”是按地区划分来计算的,同一里的人贫富不同即资产标准不同。在奴隶社会资产要看奴隶的多少,奴隶亦同资产,田地也是资产,所以户与丁的贫富有无一般要用奴隶、土地来计算,因此可以说征赋既基于丁亦基于地。并指出“赋里以入”仅指军赋而言,其征收标准为“田一井,出稷禾、秉刍、缶米”。军赋的征收已经有了按资产的成分。

战国时期地主土地所有制取代了井田制,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官僚制取代了世卿世禄制,原来那种“有禄于国,有赋于军”的下级领主须从采邑内征调兵员物资向国君提供军队与军需品的军赋制也随之废止。国家所需要的军费、兵役、劳役均由政府在整顿户籍的基础上直接向农民征调。当时各国政府都以法令规定每个农户除交纳土地税外还须向国家提供徭役、兵役,缴纳“户赋”或“口赋”。这种“户赋”或“口赋”一般充作军费之用,是以户籍为依据的。

二

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其中“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是一项针对封君、贵族等瞒产偷税而采取的赋税改革措施。事实上商鞅的这项措施不是为了变革土地制度而是为了“赋税平”,即改变赋税负担不均的状况。“为田开阡陌封疆”不是废除井田的阡陌封疆这种早已不存在的东西,而是将一切耕地打开地界重新丈量按亩征税。因为在地主阶级上层人物大量隐瞒田产的情况下,不对土地全面加以清查是无法做到同面积土地负担同样税率的。清查隐瞒的田产,迫使隐瞒者照国家规定纳税,这样就打击了封君、贵族等上层分子的特权,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加强了农战的物质基础。“赋税平”并不意味着提高地主阶级上层人物纳税的税率,也不意味着减轻地主阶级下层和农民的赋税负担,它只是在按亩征税这一点上做到了“平”,赋税的轻重不是依地位和特权而异,而是在土地上一视同仁,所以这一政策充分体现了按资产纳税的意图。

另外,商鞅规定“民有二男以下不分异者,倍其赋”^[12],用强制手段发展个体农民的户数,从而达到征收户赋的目的,如果是口赋则与分家析产无关。根据战国孟轲“八口之家”的家庭规模与“百亩之田”^[13]的占地标准,或李悝“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14]的每户人家耕种“百亩”标准,《商君书·垦令》对“食口众”的家庭“以其食口之数贱(赋)而重使之”^[15]。很明显,这都是企图以重赋的办法迫使民户划小增加户数。商鞅变法严禁“同室内息”^[16]也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也说明了户赋的存在。所以苏厉为齐致赵惠王书云:“赋田计功,王之获利孰与秦多”!^[17]贾谊也说:“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18],都从不同角度说明秦的土地征税制度是寓垦于征,直接以法令增加个体农户的数量。个体农户的增加有助于个体资产的增加,而农民的资产在物资极度贫乏的古代主要表现为土地的占有和收获。商鞅在秦国实行“连坐法”,这项法令是在“令民为什伍”整顿户籍的基础上实行的。什伍的户籍编制于献公改革时开始^[19],但只是了解丁口底数,人还属于领主。商鞅再次按什伍编造户

籍,“令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20],使户籍制度更臻完备。商鞅整顿户籍不仅限于下民,贵族的户口也需要登记,所谓“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则以其食口之数,赋而重使之。”^[21]尤其是“禄厚而税多”,是否已经开通了个人所得税的先河或是资产税的继续,无从确定。但是,《韩非子·显学》:“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实即损有余以补不足,其办法自然是通过征收富人的财产税实现的。《韩非子·六反》:“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赋税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其中“论其赋税以均贫富”应当是指通过征收资产税来解决贫富不均问题。

三

夏、商、西周三代是奴隶社会,春秋战国奴隶依然大量存在,奴隶是私有财产,对奴隶的占有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正如前文所述,奴隶社会的奴隶亦同资产,土地也是资产,征赋既基于丁亦基于地。汉初规定“贾人与奴婢倍算”^[22]的赋税政策,奴婢作为财产加倍征收算赋。口赋的征收虽然是针对全体国民,但其主要针对对象还是占有大量奴隶的各级贵族。各级贵族拥有充裕财富,对于这笔支出虽然不会影响到家计生活但也不会不介意,像董仲舒这样身份地位的大官僚尚且抨击这项制度,更何况个体农户,口赋显然是一项沉重的负担。所以史家在记载这项赋税时往往以口赋含盖这项赋税的称呼,而且对奴婢重税一直持续至王莽。因此,应该肯定地说,《史记·秦本纪》、《六国年表》记载秦孝公十四年(公元前三四八年)的“初为赋”,应该指最初以土地和奴婢占有为主的资产税。

由此可见,口赋和赏赋区分不甚严格,既是赏赋的一部分(奴隶是财产),又独立于赏赋之外(奴隶以外的人丁不属于赏赋)这样一个交叉混淆之中。根据汉代“贾人与奴婢倍算”的赋税政策,奴婢作为财产是按算赋标准缴纳的,只是加倍征收而已,秦代很可能是按正常算赋征收。《说文解字》赏字条:“汉律,民不徭,赏钱二十三。”民不徭的年龄在汉代为七岁至十四岁^[23]。“赏钱二十三”指以资产为依托交纳二十三钱。可见汉代的口钱也是以赏征赋的。直至王莽,口赋和赏赋区分都没有一个严格的界线,而且也很难有一个严格的界线,这就是赏算记载比较模糊的缘故。

关于秦代赏赋在史籍上几乎找不到记载,但是秦代有关“赏”字的简文很多,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一批秦律材料有许多赏盾、赏甲的律文以及“有罪以赏赎”^[24]的规定。“赏”,《说文》释为“小罚,以财自赎。”“赏赎”也就是用钱赎罪。从这两句话理解“赏”就是资产,“赏”并不处刑只罚缴财物。由于秦需要大量军备物资,所以在处罚罪犯时均以甲、盾之类的兵器为主。如“稟卒兵,不完善(缮)丞、库啬夫、吏赏二甲,法(废)”^[25]。“赏”也罚徭戍,有三十天、一年、两年若干个不同的役期。被罚者如不能应役很可能是折纳现金抵役,说明都是用资产作为抵押。赏盾甲比赏徭戍普遍,被罚者既有庶民也有官吏,而被赏徭戍者只有庶民并无官吏,可知“赏”基本上是一种罚缴财物的制度。被罚者按政府规定的罚额缴纳实物或按实物的法定价格折纳现金^①。无论赏盾甲或赏徭戍并未见有约束人身行动的任何规定,表明“初为赋”是为战争服务而颁布的资产税。

秦代已有算,文帝时晁错说“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

而亡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26]秦昭襄王复巴郡阆中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27]。”“货算”一词始见于《汉书·景帝纪》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诏:“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未必众。有市籍者不得官,无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应劭注:“古者疾吏之贪,衣食足知荣辱,限訾十算,乃得为吏。十算,十万也。”此中所谓“古者”应为汉代以前,至少在秦朝或战国时的秦国就已经有訾算。秦末韩信就因“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为商贾”^[28],说明韩信不具备当官为吏的货选条件,同时也说明秦朝货算的实行。《史记·萧相国世家》:“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这就为“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等提供了依据。说明秦朝户货制度已经确立,訾算很可能就是“初为赋”这种赋税的实际名称。

如果说“初为赋”是秦国訾算的起源,那么它还不能以点代面,其它诸侯国户货制度如何仍是考证的对象。但是户货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是户籍制度的组成部分,常与户籍附在一起。还在文明社会出现之前,便产生了关于氏族部落成员数目的计算方法。但以“户”作为单位来计算人口却是相当以后的事情^[29]。“户”,《辞源》释为“住户,一家为一户”。户籍最早是用于登记户口的,《释名·释书契》:“籍,籍也,所以籍疏人名户口也”。足证籍之初乃为户籍之专名。帷版以木,即木牒,籍以竹,即竹简,微有不同。《管子·禁藏》:“户籍田结者,所以知贫富之不訾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备然后民可足也。”从户籍一词的来源看,个体家庭的出现是户籍制度产生的社会前提,而且户籍不单单是统计人口,其中也包含家庭财产,特别是以土地作为资产确定贫富,说明户籍中已经含有户货调查的成分,其目的是“知贫富之不訾也”。这可能是目前所能发现户货调查的最早记录,也可以说是户货制度的源起,估计实际情况应该更早。《管子·国蓄》主张一切无税论,认为税收妨碍生产力的发展,“以室庖籍,谓之毁成;以六畜籍,谓之止生;以田亩籍,谓之禁耕;以正人籍,谓之离情;以正户籍,谓之养赢;五者不可毕用”。其中谈到户籍和户口税以及室庖、六畜、田亩等后来认定的财产税,也许这就是户货税即货算的雏形。

总之,秦代的“初为赋”上承周代的军赋、战国的户赋,下启汉代的货算,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在演变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按资产的比例征税,并主要用于军事。其本身的区别也较为明显,由按井田编制以若干家(夫)为单位,到以户籍为依据的变化过程,随经济所有制形式的变化而变化。

注释:

①《法律问答》有“如货布,入货钱如律”的规定。《金布律》有

“钱十一当一布”,表明所罚的布按一布值钱十一的标准缴纳。由此可以推知所货盾甲等物同样可按值折钱缴纳。

参考文献:

- [1]史记·秦本纪[M].
-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农民负担史(第一卷)[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30.
- [3]杨宽.从“少府”职掌看秦汉封建统治者的经济特权[A].载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一辑)[C].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第1版.
- [4]徐州师范学院学报[J].1983(1).
- [5]《秦汉税役体系之研究》评介[J].中国动态史研究,2001(8).
- [6]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172页.
- [7]汉书·食货志上[M].
- [8]史记·张耳·陈余列传[M].
- [9]汉纪·孝文皇帝纪[M].
- [10]左传[M].
- [11]春秋时代“鲁用田赋”即“鲁用甸赋”说质疑——兼论当时赋役制度中丁、户、地、资的源流变化[A].谷霁光史学文集(第二卷经济史论)[C].江西人民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 [12]史记·商君列传[M].
- [13]孟子·梁惠王[M].
- [14]汉书·食货志[M].
- [15]商君书·垦令[M].
- [16]史记·商君列传[M].
- [17]史记·赵世家[M].
- [18]贾子新书·时变[M].
- [19]史记·秦本纪[M].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
- [20]商君书·境内[M].
- [21]商君书·垦令[M].
- [22]汉书·惠帝纪[M].
- [23]汉书·昭帝纪[M].引《汉仪注》.
- [24]司空律[M].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睡虎地秦墓竹简》通行本.
- [25]秦律杂抄[M].
- [26]汉书·晁错传[M].
- [27]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M].
- [28]史记·淮阴侯列传[M].
- [29]张金光.秦制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一版,第774页.